

上海老龄问题透视

应明幼 唐元虎

按照国际规定, 60 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 老年人口占 10% 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为老龄化国家或地区。目前, 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已达 1.32 亿,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0%, 已成为老龄化国家。上海的老龄人口已达 18.1%, 比北京现在的老龄人口 14.7% 要高出 3.3 个百分点, 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省市。上海老龄问题已不可忽视。

上海老龄化的特征

1、老龄化速度快, 劳动力老龄化系数不断提升。从世界人口发展的角度看, 老龄化从“慢”到“快”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 而医学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又使人口死亡率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上海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早和执行最彻底的城市之一, 上海的自然人口已实现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等的作用使上海在未来 25 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将高达 2.6%, 老年人口的高速增长与总人口的低增长,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也使上海劳动力的老龄化系数不断攀升, 从 1990 年的 28.9%, 上升到 1996 年的 33.4%。

2、抚养比不断提升, 家庭养老面临严重的挑战。

从表 1 可以得出几乎平均每个就业者就要抚养两个人, 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另据有关资料显示 1980 年上海老年抚养系数已达到 17.6%, 1990 年达到 26%, 到 2005 年将达到 31%, 届时几乎每一个劳动力就必须抚养一个老人。而“四二一”代际人口结构又使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多个长辈的概率大大增加。这就使家庭养老日益窘困。据市法院统计, 全市赡养案件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表 1 上海家庭人口平均数和平均每个就业者赡养人口数

	1990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平均每户常住人口	3.25	3.11	3.07	3.08
平均每户就业人员	1.98	1.65	1.58	1.58
平均每个就业者赡养人口	1.64	1.88	1.95	1.94

3、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正式形成。表现在 1)、现行的养老制度存在制度单一化, 覆盖面小的问题。全市仅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员工有退休养老待遇, 而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社会保险问题尚未解决。即使是领了退休金的, 也因“死退休金对活物价”而感到经济拮据。尤其是现今的中年人群, 过去社会、企业、个人都没有为他们积蓄保障费用, 这部分人恰恰是老龄高峰期需要赡养的人口, 他们中的不少人无力为自己储蓄养老费。由此我们可以说, 上海老年人的生活供养不充分, 极少部分老年人的生活陷在困境之中。

2)、老年医疗保健工作的发展赶不上老年人口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是老年人患病率、残疾率的与年剧增, 另一方面是医疗设施不足且医疗保健工作基础差, 如老年盲人中, 占 67.27% 的致盲原因是白内障, 10.3% 是青光眼, 这两种病属可防治的, 但防

治、复明工作基础差，使较多老年人致盲；又加不少单位解决不了退休职工老年病所需要的大笔医疗费用或不允许就近就医，给老年人带来诸多不便。从明年开始，这一状况将得到改善。

4、老年生活服务设施缺乏，老年生活质量较差。住房拥挤是上海的普遍困难，但老年人的困难更大，有些老年人住在潮湿、通风不畅的地方。社会福利机构的床位数 1997 年为 13.07 万床，约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为 0.7%，与发达国家的 3%-5% 的比例有相当的差距。老年人用于家务的时间较多而用于文化生活的较少，其主要的文化方式为看电视，由于缺乏活动场所，不少老年人在马路边下棋、打扑克，对社会治安产生一定的影响。

上海老龄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有利的方面是遏制了人口增长和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但老龄化也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社会保障费用增加提高国民负担水平。人口老龄化使上海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医疗福利方面的支出增加。如 1980-1998 离退休人员数由 96.47 万增加到 220.36 万人，其人数占在职职工比例也从 20% 上升到 53%。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职工保险费用总额的比重已从 29.8%，上升到 49.5%。这些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导致了国民负担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费用的增加，又影响资本积累并转嫁到产品或人事费用上。转嫁到产品上就会造成商品或服务价格上涨，不利于上海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增强；转嫁到人事上，就会产生减员，恶化就业环境。

2、老龄化对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劳动力供给状况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老龄化使劳动力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结构的高龄化。劳动力适龄人口比重过低，劳动力供不应求，抑制经济的发展。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阶段，这种升级调整不仅包括三产结构的变动，还包括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和新产业部门的成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和流动。而中老年劳动力对长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较习惯，已形成特定的专业技能，不愿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或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这就使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的流动受损。而且老年人接受新技术的速度比较慢，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从而造成结构性失业。

其次，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情况也可能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老年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基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消费习惯，这样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市场的开拓阻力就大；另一方面，老年人比年青人的消费欲望相对要低，这就会造成市场规模的相对缩小，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另外老龄化也促使某些专用于老年人的特殊项目趋于增加，从而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

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对上海的经济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我们要实现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忽视已成强势的人口老龄化浪潮。上海地方政府应为构建一个健康和生产性的老龄社会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为迎战“银色浪潮”，具体建议如下：

1、逐步推迟退休年龄。人均平均预期寿命延迟，上海平均期望寿命到 1997 年已达 77.20 岁，比 1980 年的 73.3 岁延长了近 4 岁，因而老年人的界限也应向后推移。如世界卫生组织划分 60-74 岁的为年轻老年人，75-89 岁的为老年人，90 岁以上的为长寿老年人。老年人界限后移，退休年龄亦可随社会经济、教育、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非一成不变。“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处于特定年龄段的劳动适龄人口，而是覆盖一切具有劳动能力因而具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人口，自然包括健康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平均健康余寿增加，健康的老年人也就越来越多。健康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应该是社会的财富，把他

们挤出在就业行列，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又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实施“老有所为”，不仅可以使抚养比下降，又可兼顾在职职工缴费负担。

2、引导家庭养老，大力发展民营养老福利机构和设施。随着“四二一”家庭结构的确立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赡养观念已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与老年人分居，希望通过社会养老机构（如民营养老院）为老人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而老人们也开始接受到敬老院等机构生活。但上海养老制度单一化、覆盖面小、养老经费和设施不足的问题远未彻底解决，要解决养老问题就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目前，郊县农村老年人养老来源主要（占60%左右）是依靠家庭和亲友的赡养，而不少拿退休金的老年人也同样需要家庭的赡养。因此政府应坚持不懈地对家庭养老进行舆论引导。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同时，通过税收优惠、补贴、降低新建养老院开办费等形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盈利性的机构，通过制定居民可以承受的养老服务基本价格和管好办好官办养老机构来促进竞争，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上海养老福利事业。

3、加速人口流动，减缓老龄化速度。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大量的新生力量，尤其是新兴产业部门如金融、生物医药、微电子等等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老龄化的上海人力资源结构不尽合理如高级人才结构老化严重，高新技术人才匮乏，15-45岁适龄劳动力缺乏，对上海产业结构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而通过人才引进，可为上海导入新鲜的血液，如1995-1999年5年间上海吸引了10万人才，这些引进的人才大多为本科毕业及以上的优秀青年，他们的加盟改善了人才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上海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更良好的外部条件。加快人口流动，一方面可使上海的劳动力不因自然人口的削减而减少；另一方面直接降低了老龄化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减轻了国民负担。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责任编辑：王三傲